

目 录

总序			
费德里科·马约尔	1	弗朗西斯·乌尔	
前言		6 南亚：能人和直立人时期	71
夏尔·莫拉泽	3	拉姆钱德拉·V. 乔希	
概述		7 中国：能人和直立人时期	78
乔治—亨利·迪蒙	8	吴汝康 贾兰坡	
国际委员会	10	8 印度尼西亚：能人和直立人时期	80
各卷编者	11	赫特—扬·巴尔斯特特拉	
图表目录	12	B 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及同时代人类时期	87
地图目录	15	9 尼安德特人及同时代人类的体质人类学：概述	89
图片目录	17	贝尔纳·范德梅尔施	
表格目录	19	10 尼安德特人及同时代人类的考古学：概述	96
本卷作者名录	20	卡雷尔·瓦洛奇	
致谢	22	11 非洲：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及同时代人类	105
		弗雷德·温多夫 安杰拉·E. 克洛斯	
综述	1	罗穆尔德·席尔德	
西格弗里德·J. 德拉埃		12 欧洲(不含前苏联)：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及同时代人类	124
第一部分 从人类的起源到食物生产的开始	15	卡雷尔·瓦洛奇	
A 人类的起源和能人、直立人时期	17	13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前苏联地区	132
1 人类的起源：概述	19	瓦列里·P. 阿莱克谢耶夫	
伊夫·科鹿 德尼·热拉茨		14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西亚	140
2 能人和直立人时期：概述	23	阿瑟·J. 杰利内克	
伊夫·科鹿 德尼·热拉茨		15 南亚：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及同时代人类(旧石器时代中期)	149
3 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最初的定居点	30	拉姆钱德拉·V. 乔希	
让·沙瓦永		16 中国：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及同时代人类	152
4 欧洲：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的考古学	38	吴汝康 贾兰坡	
保拉·维拉		17 印度尼西亚：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及同时代人类	154
5 西亚：能人和直立人时期	55	赫特—扬·巴尔斯特特拉	

C 食物生产开始前的智人同名亚种(现代人)时期		产的开始	317
	159	路易斯·G. 伦布雷拉斯·萨尔塞多	
18 食物生产开始前的智人同名亚种(现代人)时期: 概述(不含艺术)	161	35 石器时代的南美洲西部(秘鲁南部、玻利维亚、阿根廷西北部及智利)	323
博胡斯拉夫·克利马		劳塔罗·努涅斯·阿滕西奥	
19 艺术的起源:概述	169	第二部分 从食物生产的开始到最早的国家	339
汉斯—格奥尔格·班迪		36 从食物生产的开始到最早的国家:概述	341
20 非洲:从现代智人的出现到食物生产的开始	175	西格弗里德·J. 德拉埃	
J. 德斯蒙德·克拉克		37 植物的驯化:概述	351
21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	190	杰克·R. 哈伦	
马塞尔·奥特		38 动物的驯化,从食物生产的开始至5 000年前: 概述	363
22 前苏联:旧石器时代晚期	207	桑多尔·伯克尼	
瓦列里·P. 阿莱克谢耶夫		39 史前时代晚期的埃及	371
23 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欧洲艺术	216	莱赫·克日扎尼雅克	
汉斯—格奥尔格·班迪		40 非洲(不含埃及):从食物生产的开始到大约 5 000年前	383
24 西亚:从旧石器时代中期末叶到食物生产开始	223	戴维·W. 菲利普森	
奥弗·巴尔—优素福		41 西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约12 000— 5 000年前)	394
25 南亚:食物生产开始前的智人同名亚种时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	238	詹姆斯·梅拉特	
拉姆钱德拉·V. 乔希		42 阿拉伯半岛的史前史	410
26 中国:食物生产开始前的智人同名亚种时期	241	阿卜杜拉·哈桑·马斯里 (与艾哈迈德·哈桑·达尼合作)	
贾兰坡 吴汝康		43 南亚: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阶段	415
27 东南亚和日本:食物生产开始前的智人同名亚种 时期	243	艾哈迈德·哈桑·达尼	
卡尔·L. 胡特雷尔		44 中亚和北亚:新石器时代	425
28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5 000年前智人同名亚种 时期	256	阿纳托利·P. 杰列维扬科	
约瑟芬·M. 弗勒德		45 东南亚和朝鲜半岛:从食物生产的起源到最初 的国家	436
29 美洲人类的起源	269	苏恒翰	
何塞·L. 洛伦索		46 中国:新石器时代	449
30 北美洲史前史	275	安志敏	
艾伦·L. 布赖恩		47 欧洲:新石器时代	456
31 墨西哥与中美洲:从人类的到达食物生产的 开始	286	西格弗里德·J. 德拉埃	
何塞·L. 洛伦索		48 爱琴海:新石器时代	466
32 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南美洲北部与亚马孙河流域: 古代狩猎者的生活方式	294	赫里斯托斯·杜马斯	
马里奥·萨诺哈·奥维迭恩特		49 地中海西部的文化:新石器时代	475
33 南美洲安第斯地区以外的史前史(巴西、巴拉圭、 乌拉圭和阿根廷,31 000—5 000年前)	304	让·吉莱纳	
奥斯瓦尔多·R. 埃雷迪亚		50 巴尔干半岛与东南欧:新石器时代	491
34 赤道和热带的安第斯山脉:从人类的到达食物生		米卢廷·加拉沙宁	

51	中欧：新石器时代 延斯·吕宁	504	58	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南美洲北部与亚马孙河流域：食物生产的开始 马里奥·萨诺哈·奥维迭恩特	592
52	前苏联的欧洲部分：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 尼古拉·J. 梅尔佩特	521	59	赤道和热带的安第斯山脉：从食物生产的开始至 5 000 年前 路易斯·G. 伦布雷拉斯·萨尔塞多	596
53	欧洲的大西洋地区：新石器时代 皮埃尔—罗兰·吉奥	533			
54	欧洲北部的低地地区：新石器的同化 莉莉·凯拉斯	552		后记 西格弗里德·J. 德拉埃	601
55	欧洲的巨石纪念物 莉莉·凯拉斯	561		索引	609
56	欧洲的采矿：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 罗伯特·谢泼德	578		图片	
57	墨西哥与中美洲：早期的食物生产 何塞·L. 洛伦索	589			

综 述

西格弗里德·J. 德拉埃

本卷缘起

1979年新版《人类文明史》计划伊始,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国际委员会主席保罗·E. 德·贝雷多·卡内罗教授委托我以顾问的身份,就初版中涉及到史前史的部分写一份批判性分析报告。该报告(De Laet, 1979)被分发至委员会各成员手中。接着我应邀作为观察员出席了1980年9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60多位顾问的报告,委员会认为原计划对初版进行的修改难以执行,因此最好编撰一部全新版本,在其中所有文化均应获得恰当的地位。

委员会委托我组织一个史前史编撰组,确定文字出现以前的各族群在整部著作中所处的地位。编撰组由佩德罗·卡拉斯科(墨西哥)、艾哈迈德·H. 达尼(巴基斯坦)、已故的谢赫·安塔·迪奥普(塞内加尔)、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何塞·L. 洛伦索(墨西哥)、理查德·B. 努努(加纳)、苏恒瀚(美国)和已故的夏鼐(中国)组成,于1981年4月29—30日及1981年11月16—18日召开两次会议,首先讨论到写作前对这一时期进行研究时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

与此同时,委员会办公署于1981年9月25—26日召开会议,讨论将作品进行时期划分,并对新版各卷设定了时限。因此,编撰组第二次会议主要致力于为第一卷草拟一份相当详细的计划,以及可能受邀参与该卷一章或多章编撰的同行名单。选择这些人员时,参照了两大标准——地理分布尽可能地广泛,以及最重要的,能够胜任。1983年1月,该计划和名单首次被提交给办公署,后又提交给委员会并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第一卷的主编,由三名副主编协助——A. H. 达尼负责亚洲,R. B. 努努负责非洲,J. L. 洛伦索负责美洲。此后,编委会又召开了几次会议。我与作者联系(他们基本都未拒绝),并请各位在委员会就强调的主题所设定的一些准则下,为其负责的章节编写一份详细的大纲。根据这些大纲,我为第一卷编制了一份详尽的计划,于1984年9月举行的会议上将计划提交给办公署进行评审。作者(包括编委会成员在内共53名,来自31个不同的国家)需要在1985年前提交初稿。初稿首先交给委员会,然后发给第一卷的所有作者,再送交由主编、副主编、莉莉·凯

拉斯(瑞典)、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以及路易斯·G. 伦布雷拉斯·萨尔塞多(秘鲁)组成的审读委员会(于1987年1月12—23日及3月9—20日会面)。所有评审意见随后被反馈给作者,协助他们编撰最终文本。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没有强制对章节进行任何大的改动。当意见产生分歧时,编委会成员就主题编写了一份简短的注释。由于某些不可避免的因素,1988年年中,国际委员会才收到所有文稿。因此,此后出现的新史料不可能囊括在内。

史前史

文字发明前的时期

新版《人类文明史》第一卷的时间跨度从原始人类(在物种中可归类为“人类”)的首次出现,到文字的发明,再到约5000年前城邦的出现。这一“史前”时期持续约200万—300万年。其历时之长超乎人们的想象,但以下两个比喻可能有助于读者想象当时的情况。

首先,如果用总长为5000米的线代表“能人”(homo habilis)出现以后经历的约250万年的时期,每年的长度少于2毫米。文字出现之前的时期代表4990米,而所谓的“历史”时期(有文字记载的时期)的总长则只剩最后10米。从基督纪元开始的时期长度为4米,而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的时期长度仅为1米。

其次,可将人类存在的总历史时期比喻成一天(24小时)。能人在这一天刚经过1秒时出现,每个世纪相当于3.456秒。文字的发明和第一批城邦的出现则在午夜前,时长不足3分钟,而哥伦布的首次美洲远航则是在这一天结束前约17秒多。

“史前”：一个错误却已因袭下来的术语

在文字发明之前的超长时期通常被称为“史前”。尽管该术语几乎普遍出现在所有语言中,但基本上是错误的。严格地说,它从历史中排除了约99.8%的人类存在时间,并使“真正历史”(以文字记载为基础)在该存在中的比例减少至0.2%。此外,直到近来才采用书面文字的人群对该术语不屑一顾,且有理

由认为,自身的过去与更早具备读写能力的人群的过去一样,都是“历史”。

“史前”时期见证了人类的诞生、儿童期和青春期。它将我们从人类起源带到文字的发明、第一批城镇的出现、第一批城邦的出现以及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阶级社会是几千年来“真正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史前”时期见证了人类文明基本特征的缓慢发展,缺少对它的了解,当代各种文化的许多突出特征就仍将是不可理解的。

“史前”这一术语出现于19世纪,最初用来指人类与现在已灭绝的动物同时共存的时期。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年代非常久远的地质沉积中发现了此类物种的遗骸。这说明人类出现远远早于《圣经》年表(见第601页)所述的6000年。“上古”(“大洪水之前”)这一形容词曾在短时间内被指代这同一时期。另一方面,“史前”的含义得到了扩展,包括文字出现之前的所有时期,因此也包括许多更近一些的时期的遗存。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古物研究者”的注意力,他们有时甚至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见下文)。然而,历史学家对这些缺乏文字史料的时期毫无兴趣,而且史前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接触。但时代已经变迁,自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以来,他们的接触逐渐变得频繁起来。这也得益于两大学科的发展,即:一是对史前时期的研究已经取得巨大进展,二是历史的概念本身自年鉴学派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L. 费夫尔(1953, p. 428)称,从完全意义上来说,历史与“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表现人类,标示人类存在、活动、感受和习惯的事务”有关。而事实上,当费夫尔作如上阐述时,最杰出的史前史学家早已花费许多年追寻历史这一广义上的目标了。这种同步趋势明显促进了将所谓的史前时期研究整合至人类历史的一般框架当中(De Laet, 1978, p. 228; 1985, pp. 149ff.)。

既然“史前”这一术语不恰当,有人可能会提议用“原史时代”(protohistory,即最早的历史)替换之。然而当前人们已将“原史时代”固定用于指某一民族或地区的居民仍不识字,但其历史中被更为先进和已经识字的相邻民族文字记载的时期(如凯尔特人仍不识字,但被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提及)。有时“原史时代”还用于使用书面文字,但其语言仍不被了解的人群(如伊特鲁里亚人)。不论情况如何,术语“史前”和“原史时代”都已根深蒂固,任何想要替代它们的想法皆不切实际。

文化历时性的发展和划分史前时期所遇到的问题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本卷不涉及文字出现之前的所有时期,而只包括所有人群都尚无文字的这一阶段。最早的文字系统出现于5000多年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其他地区都停留在史前阶段。例如,文字在埃及发明了1000多年之后才出现在中国;在克里特岛,公元前2千纪末才出现文字资料;在西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从公元前才开

始,1000年后才在东欧和北欧出现。而在非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地方,文字资料的出现只能追溯到殖民时期。因此,《人类文明史》后几卷中还会经常写到尚无文字的民族。

不同文化阶段的非同步发展与历史同时性之间的矛盾成为了主要问题。我们是应该按照不同的文化阶段来划分,还是纯粹地按时间顺序划分?经过慎重考虑,国际委员会办公署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法。每一卷所选的截止时间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历史上都包含极其重要的事件,但是往往这些事件在其他地区却没有受到关注。因此,在“地区篇”中,编者会选择同这一卷的结束时间基本上同时的地区内重要时点,这样一来便灵活了许多。例如,第一卷中的欧洲史就延伸到了截止日期后的两三百年的时间。在这一卷里,时期的划分带来了许多的问题。C. J. 汤姆森提出了“三代法”体系(见第4页),将欧洲分为传统意义上的子时期(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中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铜器时代或次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早、中、晚期,第一铁器时代或哈尔施塔特时代,第二铁器时代或拉坦诺时代),这不仅代表了技术发展水平,还代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某些阶段的缺失,或特征迥异,或时间顺序不同,上述划分在很多其他区域不适用。例如在日本,约1.25万年前发明了陶瓷容器(其出现在其他地区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之一),因此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在约2500年前出现农业生产是相当晚的,几乎与青铜和铁的制造同处一个时期。假如套用欧洲时期划分法,日本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因此,给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划分方法相当重要,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美洲。在第一卷制定出一个可行的,或至少让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划分方法非常有必要。有人提出,以开始食物生产为标准,将这一卷分为两大部分。在人类历史上,食物生产无疑是区别于过去的主要文化分界之一。

第一部分包括人类起源时期和传统上的“旧石器时代”,仍旧占了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的99%。同样,有必要再把它分成几个时期。在一些存在疑问的案例中,不是像以前那样完全根据考古标准进行细分,而是采取古生物学的划分方法,把历史长河中人类属的种类和亚种的相继出现作为主要阶段,这似乎是更好的办法。第1章主要介绍人类的起源,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分别介绍能人和直立猿人时期、尼安德特人及其同时代人所处时期以及智人到食物生产初期这一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根据基本相似的纲要计划来展现历史所有时期,委员会决定每一个大部分都必须包含有作为概述(概述需明确指出所涉及阶段的特征、强调所选定的科学文化主题)的理论章节和一系列“地区”篇(在更局部的范围对本阶段进行考察,强调某一地区内不同文化的特征)。地区篇需体现分析性研究特点,相反,概述则尽力对这一分析性研究进行综合考察。

本卷第二部分让读者了解从食物生产的开始到第一批城邦的建立这一段时期,即可以理解为从“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

命”(这两个术语最初由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著名史前史学家 V. 戈登·蔡尔德提出,现在被普遍使用,但在字面上仍有争议,见第 36 章)。第二部分也分为概述和各地区篇。需要强调的是,食物生产的开始时期应根据不同地区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地区,该时期在《人类文明史》第一卷截止时间后开始。这些地区出现在本卷第一部分,讨论到 5 000 年前;而在第二部分,这些地区仅作为与第一部分的相互参照而提及。

土壤档案

非专业人士可能会提出疑问:没有书面资料,我们如何了解远古时期历史?幸运的是,我们保留了一种称为**土壤档案**的资源,现在已经慢慢开始破译。所谓“土壤档案”是指过去的人们在土壤中留下的线索:由他们的尸骨和劳动产品形成的档案。尸骨是古生物学(常常也称作古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劳动产品是史前考古学的研究主题。这两门学科正如天平的两端,“承载着两类重要的资源:尸骨和石器,即实体和精神或生物学和文化”(Coppens, 1984, p. 9)。

然而,土壤档案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它们传达了史前人类居住环境的大量信息,还有助于我们为史前史建立一个(相对的和绝对的)年表,以追溯过去的文化。

史前科学的起源与发展

为对史前研究的发展进行简要勾勒,我们可以明确几个阶段:

1. 形成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 A. 开始—1859 年
 - B. 1859—1918 年
2. 过渡阶段(1918—1945 年)
3. 当前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形成阶段

开始—1859 年

要理解当前史前研究的趋势,需要明白的是,它们是众多早期方法的研究目标逐渐聚合的结果,通常具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必须论及**古典考古学**,因为它对史前考古学具有重大影响。古典考古学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出现于欧洲,主要致力于希腊和罗马的重要艺术遗迹研究,后来又增加了对埃及和西亚艺术遗迹的研究。这使得古典考古学几乎等同于古典艺术史,并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半叶广泛流传。即使在今天,尽管这两门学科在目标和方法方面明显不同,但它们仍然容易被混为一谈,尤其对一般公众而言。古典考古学起初仅限于研究纪念物遗迹和艺术品,到 18 世纪随着赫库兰尼姆(始于 1719 年)和庞贝(始于 1748 年)的发掘而重获新生。法国的克洛德·德·凯吕斯和德国的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这两个名

字与这一时期息息相关,标志着**考古学活跃期**的开始,即通过发掘找寻过去文明更多的遗迹。另一重要年份是 1798 年,即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这一年。这位未来的皇帝带着一班学者随征,他们长达十卷的报告标志着埃及学的真正诞生。这激发了人们对野外发掘埃及古物的兴趣,当然主要是为了欧洲一些大博物馆的利益。因此,埃及总督在 1885 年设立了文物管理处,并对发掘工作实行严格管制。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学几乎与埃及同步。然而很不幸,由于劫掠事件的发生,加之立法的缺失,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比在埃及开展的考古学拖延时间更长。

其次,史前研究最早的基础之一为**古物研究者的活动**,这个词原与考古学家同义。事实上,古物研究的传统几乎与古典考古学一样悠久,彼此联系非常紧密。古物研究者主要活跃在欧洲国家,这里的古物遗迹非常稀有。与古典考古学家一样,古物研究者首先致力于对各自所在地区古迹的描述和研究。这些古迹——巨石墓、圣殿、堡垒等诸如此类——大部分可追溯到史前时期。人们赋予它们许多传说,如巨石墓据说由恶魔或巨人建造。也有另一种说法,即所发现的遗迹是自然力量所为:打磨了的燧石斧被认为是闪电撞击地面形成的“雷电石”。在古物研究者的努力下,这些遗迹的建造开始归因于前罗马时期定居此地的人们,古物史学家称他们为高卢人、古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等等。在这些古物研究者中,值得一提的有英国 16 世纪的约翰·利兰和威廉·加登、17 世纪的约翰·奥布雷、19 世纪的威廉·斯蒂克利以及法国 18 世纪的贝尔纳·德·蒙福孔、阿内—克洛德·德·凯吕斯以及泰奥菲勒·科雷·德拉图尔·多韦涅。然而,受到瑞典和丹麦王室保护的古物研究者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发现,对史前研究的进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1611—1632 年在位)设立了国立古代文物事务所,负责草拟瑞典考古遗迹的清单并加以保护。同样在瑞典,1662 年在卡尔十一世的统治下,乌普萨拉大学第一个“国立”考古学教席设立,由一名专业的考古学家任职(直到 1818 年才在荷兰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二个“国立”考古学教席)。四年后的 1666 年,瑞典国王颁布了第一部保护考古遗物和遗址的法律。同时还须提及的是丹麦的奥勒·沃尔姆(1558—1654),他草拟了丹麦的考古遗迹清单,撰写了一部丹麦历史著作。在书中,他将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他还汇集了相当有分量的考古收藏,随后被列为皇家收藏,最后于 1844 年被哥本哈根的北欧古物博物馆收藏。与瑞典一样,1684 年丹麦设立了国家古物研究机构。沙皇彼得大帝(1672—1725)也根据瑞典模式颁布法令,规定任何人发现古物后,必须将其转交给专门负责古物发掘的考古机构。

最早堪称科学的发掘始于 18 世纪中期的丹麦,如 1744 年埃里克·蓬托皮丹及未来国王(当时为王储)弗雷德里克五世对耶厄斯普里斯的巨石墓的发掘。在此之前进行的唯一一次科学发掘是 1685 年对法国科谢雷一座巨石墓的发掘。丹麦另一伟大成就是在拉斯穆斯·涅鲁普的推动下,建立了哥本哈根北

欧古物博物馆。该博物馆于1807年动工、1819年开放。为了有组织地展示收集物,保管人克里斯蒂安·J. 汤姆森研究出一套有名的编年排列方案,“三代法”。他假定武器和工具首先是由石头制成,然后是青铜,最后是铁,由此产生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在公元前1世纪,拉丁诗人卢克莱修已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理论,但只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汤姆森则通过精细的观测建立起了他的体系。19世纪,其他一些国家也参照哥本哈根博物馆的模式组建了博物馆。

全欧洲涌现出来的与考古学相关的学术团体加强了古物研究者的影响,尽管这些团体并非专属考古学。它们大部分可追溯至17世纪,如猞猁学院(罗马,1603)、皇家学会(伦敦,1663)和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巴黎,1663)。伦敦考古学会是第一个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718年,1751年获得皇家特许证。

这些古物研究者中的佼佼者对于科学方法的发展贡献甚巨,体现为发掘技术的提高,对历史遗迹确定年代并提出解释。他们对大博物馆的建立、发掘管理条例的执行、保护遗迹和遗址的立法以及根据古典考古学课程开发国立考古学的大学课程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当前史前研究的另一重要根源是自18世纪以来,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对在某些地质地层发现的人类遗迹——人工制品和骨骼化石——所进行的研究。早在1797年,约翰·弗里尔在英国萨福克的霍克森地深超过2.7米的原状砾石层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和灭绝动物物种的骨骼,这些人工制品后来被鉴定为阿舍利石斧。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和这些灭绝动物物种同处一个时代,比普遍接受的《圣经》年代学所确定的6000年要早得多。

大约在同一时期,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比利时都有类似的发现,根据这些发现所得出的结论和弗里尔得出的结论相同。然而,这些结论不仅在《圣经》年代学的信奉者中引发了争议,而且在许多受到法国乔治·居维叶和英国威廉·巴克兰影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当中也遭到了异议。居维叶反对巴蒂斯特·拉马克的进化论,提出了自己的灾变论,并否定了人类化石存在的可能性。许多年后,这些发现才得到充分的认知。

19世纪50年代,史前史学家雅克·布歇·德·克雷弗克·德·佩尔蒂斯对法国索姆河岸的矿场和砾石进行了研究。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人工制品以及动物骨骼化石。他出版的著作最初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后来伦敦皇家学会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和约翰·埃文斯在1859年提交给学会的论文中对他予以肯定。

四年后,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发表《人类古迹的地质学考据》一书,为布歇·德·佩尔蒂斯以及关注人类伟大古迹的先驱们所提出的理论赢得了决定性的认可。此外,当时正值观点转变的时刻。1857年,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发现了人类的颅骨化石和各种骨骼化石,并以此命名为尼安德特人。这一发现引发

了古生物学家激烈的争论,但最后证明化石亚种确实存在,尼安德特人和晚期智人的差别很大。

1859年,布歇·德·佩尔蒂斯的理论得到证实;同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其著作《物种起源》。四年后,托马斯·H. 赫胥黎将达尔文的理论扩展到人类进化。因此可以说,直到1859年前后,史前研究,尤其是对最早时期的研究,才作为一门学科获得认可。

地质学家所产生的影响同样有助于进行地层发掘,以及对他们在建立相对年代学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例如,在19世纪中期前不久,延斯·A. 沃索与地质学家合作,在丹麦进行发掘,以验证C. J. 汤姆森提出的“三代法”体系,自此开启了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界专家之间的合作——如今此类合作已非常普遍,被视为史前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四,要了解史前研究的现状,须考虑考古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人类学的界定相当模糊,需要加以阐明。

在法语中,“人类学”一词指人类体质或体格学,是研究不同人群解剖结构、生理特征及进化历程的学科。然而当特别针对史前人类时,“人类学”一词(这时通常被称作古人类学)就与史前历史紧密相联了。在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人类学”一词相当于法语中的anthropologie culturelle et sociale;主要针对在现代(18—20世纪)尚未发明文字、社会组织相对小型、仅掌握简单技术的人群,通过实地研究的方式分析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结构(Freedman, 1978)。在美国,出于某些历史原因,这一派的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早期包含史前历史。1492年新大陆的发现建立了欧洲人与尚处于史前阶段的部落之间的联系:大多数部落仍不会使用金属器具,主要依靠石质武器和器具。在当时,仍不能确定在欧洲发现的石器是否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凭着对美洲人工制品的了解,早在16世纪,一些学者如米凯莱·梅尔卡蒂等人就对欧洲的发现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将其归因于史前人群,其文化阶段必定与这些美洲部落相类。

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尚无定论。依据相关理论,他们是埃及人、腓尼基人、迦南人、以色列原始部落或沉没大陆中的亚特兰蒂斯居民的后代。这些猜测主要依据前哥伦布时期的古迹,例如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墓葬群。然而,一些更谨慎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古迹的建造者正是如今土著居民的祖先。托马斯·杰斐逊(后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在1784年发掘了其中一些古迹。尽管他无法证明这一理论,但其发掘凭借运用的技术和精确的观测,几乎比先前的实地研究领先了一个世纪。杰斐逊是检验树轮年代学可行性的第一人。

在美洲逐渐建立起来的早期和当代人群之间的联系,使得美洲人类学家自然而然地将史前人群的研究,首先是新大陆史前人群的研究,置于人类学研究范围之内。根据该学派的权威解释,“当前人类学”这一学科不仅包含文化和社会人类学,还要包含体质人类学、史前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和人种学等等,不胜枚举。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学家很快就将研究的人

群描述为“原始人”，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称号所传达的贬义及其暗示的高傲姿态，被指称的人们对此表示憎恨。该术语现已被普遍弃用。人类学可与社会学相比照，人类学家常常将自己描述成没有文字的社会社会学家。因此，就目前工作的构想而言，人类学追求的目标和史前科学追求的目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两门学科显然彼此存在关联（见第8页）。

1859—1918年

1859—1863年是史前研究的决定性阶段。这是形成阶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段时期，可简略叙之。

对人类古物的《圣经》年代学和普遍接受的“三代法”体系的反驳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1865—1875年，提出了建立在社会经济模式基础上的其他史前阶段划分方法。这些方法对人类学家的影响超过了对史前史学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865年斯文·尼尔森提出的观点，英国的爱德华·泰勒和美国的刘易斯·H. 摩根都借用了他的论点。摩根（Morgan, 1877）将文明分为七大阶段，称之为“各种族时期”：

1. 初级原始状态，人类起源到火的发现；
2. 中级原始状态，火的发现到弓箭的发明；
3. 高级原始状态，弓箭的发明到陶器的发明；
4. 初级野蛮状态，陶器的发明到动物的驯养；
5. 中级野蛮状态，动物的驯养到铁矿石的冶炼；
6. 高级野蛮状态，铁的发现到音标字母的发明；
7. 文明状态，从文字和字母的发明开始。

摩根的观点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影响重大，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前理论的基础。

达尔文进化论开始延伸到文化领域，19世纪进化论和传播论之间开始发生争论，且一直持续至今。早在1866年已产生了建立促进国际合作组织的需求。当年在瑞士纳沙泰尔举办了国际史前人种学会议，隔年成立了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即国际史前科学联盟的前身（De Laet, 1971）。这一时期进行的发掘就技术层面而言存在许多不足，但仍不乏一些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先驱者，如前文所提到的托马斯·杰斐逊和延斯·A. 沃索；此外还有朱塞佩·菲奥雷利（庞贝）、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奥林匹亚）、威廉·M. 弗林德斯·皮特里（埃及）、奥古斯塔斯·H. 皮特—里弗斯（英国）以及“帝国界墙委员会”（在德国和拉埃提亚北部的罗马帝国驻防边界进行的系统性发掘）。这些发掘体现了相对年代学建立过程中地层学的重要性，以及发掘场址时期划分的必要性。对绝对年代学的需求也不断增强。托马斯·杰斐逊也意识到了树轮年代学的可能性。A. E. 道格拉斯于1901年第一次成功地应用树轮年代学，确定了前哥伦布时期亚利桑那州普韦布洛·博尼图遗址的确切年代。同年，A. 彭克和E. 布吕克纳将更新世分成四个冰川期，为旧石器时代的相对年代提供了地质框架。在瑞典，耶拉尔德·德·耶尔根

据对纹泥的分析，计算出了北欧最近1.2万年的绝对年代。1853—1854年的冬天，费迪南德·凯勒与许多自然科学家一起在瑞士发现了第一批湖村，使自然环境的研究变得极其重要。最后，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岩画和石刻，以及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发掘的许多已消失的辉煌史前文明的遗址，大大地激发了公众对史前研究的兴趣。

过渡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在这一过渡阶段，考古学仍然存在一些童年期的不足，尤其是无序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分析方法缺乏科学准确性以及阐释的主观性。此外，史前考古学面临着来自科辛纳学派种族主义理论的质疑，后者声称其为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

幸运的是，这一阶段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考古研究普遍不再局限于欧洲、埃及、西亚和美洲的一些地区（美国、墨西哥和秘鲁），开始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考古学探测也逐渐世界化。考古学借助空中摄影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一些杰出的考古学家利用新的三维方式提高了发掘技术，例如英国的莫蒂默·惠勒爵士和荷兰的阿尔伯特·E. 范吉芬。在史前研究的形成阶段，主要目标是发现物品——人工制品，而在此过渡阶段则是认识到土壤能够产生更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不同的结构、有机物遗体腐烂引起的土壤变色痕迹等。为了发掘并记录这些资料，必须开发非常精密的技术，有些技术的精细程度堪比外科手术。实地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确定埋藏在土壤里的考古材料的环境——“环境证据”。另外，地理、环境和生态学方法对考古资料的阐释越来越重要。史前考古学的整个目标都发生了变化。研究兴趣从人工制品、工具、陶器和艺术品转向了在土壤里留下痕迹的那些人及其生活方式、经济、社会组织和信仰。

关于这一点，可引用莫蒂默·惠勒的三句话阐述之：“考古学家发掘的不是物，而是人。”“简言之，考古学是一门必须去经历、必须‘赋以人性’的科学。”“无生命的考古学是被风吹起的最干燥的灰尘。”（Wheeler, 1954, pp. v, 2）

当前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

史前考古学的当前趋势可简单地总结如下：

1. 对自然科学的依赖不断增长，自然科学提供了绝对年代测定的新方法，特别是关于人类历史最遥远的时期，将这一段历史的开始时间向前推至250万或300万年前。自然科学还为我们提供了古人生活环境以及环境演化的更为精确的画面。

2. 对考古学的认知论、理论和方法论的兴趣得到提高。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兴趣的增长源自英语国家人类学带来的更大影响以及美国疆域外的“新考古学”。

3. 史前研究不仅在欧洲（包括前苏联及其后继者）、美国和中国得到加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

立的新兴国家也得到发展。如今史前研究更多是由本国科学家进行的,同时也与其自身过去的历史、文化认同及“真实性”的研究紧密相联。

- 6 4. 随着研究地域的扩大,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致力于史前研究的大会、学术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层出不穷。因此,如今对考古学资料进行解释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和方法论上的趋向,在它们得以产生的领域之外越来越被人们了解并讨论。

对主要史前科学及其辅助性学科的综合

考古学

“史前”和“考古学”这两个术语经常被混淆。须牢记于心的是,“史前”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具体文字信息的一段时期,而考古学则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的是过去的历史,探寻古代人类的物质遗迹是其基础。考古学是主要的,却不是唯一帮助我们了解史前历史的学科。而且,考古学不仅局限于史前时期,还包含了过去的所有时期,甚至最近的时期。例如,“工业考古学”主要涉及的是19世纪的遗迹。这里主要涉及的当然是史前考古学。在此,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考古工作的不同阶段,并讨论在这些不同阶段里所借助的各种辅助性学科。

考古勘测

如今,考古学家们不再满足于记录和发掘一些在土壤表面仍清晰可见的过去遗物,或是在土地开发、市政工程或土壤侵蚀过程中不经意间发现的遗迹。通过对深埋在地下或不易被普通观察者察觉的沉积物进行探测,考古学家们探索出一系列积极勘测的方法。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新公路和水力发电大坝的修建等,许多遗址面临着遭到破坏的危险,有些遗址覆盖广阔的区域,为了最大可能地保存这些属于我们文化遗产的遗迹,需要采用这些积极的勘测方法。主要勘测方法可能包括:

1. 通常将航空照片与摄影测量法相结合,用以记录地平面的细微变化,否则这些变化几乎难以察觉,这些变化是地下基址或被填埋的水渠的痕迹(遗址阴影)。航空照片同样记录往往由于埋埋的考古遗迹所造成的土壤颜色(土壤标识)或植被发育(农作物标识)的差异。电子操纵拍摄的航空照片通常会凸显颜色对比度,便于进行诠释。须着重强调的是,航空照片作为探测的一种手段,只能用于空旷的地形,在森林区无法发挥作用。在不远的将来,利用卫星(遥感)拍摄的照片将同样适用于考古学。

2. 利用水下探测的方法来探测船的残骸或水下遗址。为此已开发了高精密设备(水下电视摄像机、深海潜水器等)。

3. 利用质子或铯磁力计、质子倾斜计等设备,对金属物体、灶、炉、填土坑洞和井、建筑物与坟墓等进行磁性探测。

4. 利用测量下层土抗力的电位计,对下层土中因(降低传

导性的)地基或(增强传导性的)填土坑洞引起的电子异常现象进行探测。

5. 通过声学或地震的方法进行探测,利用记录通过反射、折射、共振或不同频率的赫兹电波传送获得的振动现象的设备。

6. 土壤的化学分析,尤其是磷酸酶和钾含量的测量,使得探测人类留在土地上的标记(前居住地)成为可能。

发掘

曾经一段时期里,发掘工作仅限于发掘未出土的遗迹,或寻找艺术品抑或其他用于展览的物品。如今的考古学家们则竭尽全力来重构过去的各种文化的所有方面。他们的目的在于探寻史前人类的生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其经济基础、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实地勘测者的任务是从土壤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这不仅意味着发掘包括最小的燧石片在内的所有东西,同时也要记录下相关特征最细微的痕迹,如由易腐的有机材料构成的物品和结构所引起的土壤变色。

勘测者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会反复停留一段很长的时间。每一遗迹的考古层序、彼此相关的人工制品和建筑必须给予精确的界定。不同时期的遗迹通常是按照自身的层序被发现的,而这些层序经常被混淆或重叠,需要精密的技术将之分类清理出来。此外,必须根据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孢粉学分析或化学分析等来抽取不同的样本。任何发掘工作或多或少都会破坏遗迹,因为需要移开上层、露出下层,才能取出发现的东西。至关重要,需仔细记录(只要可实际操作和环境允许)每一处遗迹的三维方位、每一件物品和每一个特征及其与不同的考古和地理层级之间的关系。依靠书面笔记、平面图精确比例图样、照片、印痕(如使用乳胶)、用纤维素胶片制作的侧影像、笛卡尔坐标数据等方法完成记录工作。

从理论上讲,发掘工作及记录应做到精确,以便可以还原成未发掘之前的状态。由法国史前史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朗提出的“民族志学”发掘,是利用目前技术可以实现的典型案例。因此,现代发掘要求考古学家具备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的7实际知识,能使用专门的设备,能做十分复杂的计算,有时还需要运用几何学、三角法和对数知识。

遗憾的是,如今并非所有的发掘都能达到这些严格的标准。而显然,那些非正式的或未经授权的发掘正在逐渐减少。大多数实地调查研究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针对濒危的地下遗迹进行的拯救性发掘。在一些国家,法律规定任何工厂或道路的修建必须首先由考古学家进行探测。一旦工地被证明包含考古材料,考古学家将获得发掘遗迹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此类发掘有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以国际合作的形式进行,例如在上埃及和苏丹修建阿斯旺大坝的案例。

第二,丰富国家古迹遗产的发掘,以增强其旅游景点的数量

及吸引力,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带有经济目的的发掘不会影响到研究的科学价值,考古学反而能增加一定的国家财政收入。

第三,即最具科学价值的发掘,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主题发掘”,主要针对为获得有助于解决文化或历史上重大问题的最新资料而仔细挑选的遗址。此类发掘往往规模宏大,一处住地或整个区域可能需要被全部发掘(居住地发掘和区域发掘)。此类调查研究通常涉及到各种学科,且国际化,譬如为解决人类起源的问题在非洲南部和东部进行的发掘,为研究畜牧业和农业的起源在西亚进行的发掘。

考古材料的描述与类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描述性分析的方法论和考古材料的分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之前,由于缺乏人工制品类型学和分类学定义方面的学科知识,人们只根据外表与19世纪的工具体类似的特征来命名人工制品。这样的术语使用随意,无类型学区分,且往往包括多种含义。40多年来,这种做法遭到强烈反对。为了达到系统化和分类化,必须运用非常严格的分类学规则,这类知识常常在生物学、古人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得以体现。作为类型学基础的要素、人工制品的形状和尺寸均需要精确而客观的断定(可借助曲线图、图表、柱状图、量图等)。人工制品的原料也需(通过岩石学、光谱分析、中子活化分析和色度学等知识)界定。此外,还需继续致力于术语标准化。更重要的是,对考古材料进行分类越来越需要借助量化——对量化及空间的数据建立不同的系统、绘制类型表格,以决定分类单位及细分情况(如文化、工艺等)。为了建构类型学和对材料进行分类——尤其是材料日益丰富——计算机的使用和资料储存系统的建立越来越普遍。新方法常常也使用复杂代码和符号,需要掌握有关数学、统计学和那些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无法掌握的数据处理方面的知识。因此,他们必须与数学家,尤其是计算机程序员密切合作。

此外,这场名副其实的考古方法论大革命自身也存在缺陷,这是无可否认的。促使术语标准化、研究新的考古类型和新分类方法所做的努力是一场不协调的变革,有时会带来更大的混乱,甚至引发争议(见第8—9页)。

修复与保护问题:实验方法

文物发掘并不意味着相关的历史痕迹就此得到解救。人类应该尽可能地保护文物,这些都是人类文化和艺术遗产的组成部分。这些古代痕迹在土壤环境中长时间遭到损坏,出土后也会受到大气、生物、物理和化学原因的破坏。过去几十年中,文物保护工作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就此而言,保存在考古现场的建筑或艺术遗迹与保存在博物馆的文物应加以区别对待。

对于那些纪念建筑来说,壮观但却非科学的复原,如法国建筑师维奥莱—勒—迪克所做的那些,似乎已幸运地成为了过去。

现存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巩固并保存废墟,另一方面是保护那些古遗迹和艺术品不受时间的侵袭。高度工业化地区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已经对很多史前的、古老的或者说是原始的历史遗迹构成威胁——雅典的帕特农神殿和古罗马的历史遗迹便是例证。在其他地方,埋藏很久而今出土的废墟也受到其他因素的破坏。位于巴基斯坦、数千年来在地下受到保护的摩亨佐—达罗遗址现在也受到诸多威胁,包括不断上升的地下水、水中盐分的腐蚀和印度河洪水的侵袭。1940年在法国发现的拉斯科岩画也面临同样的命运。拉斯科洞穴一向公众开放,就吸引了众多游客,当地岌岌可危的气候平衡和生物平衡状态遭到破坏,水藻不断繁殖且很难根除。还有就是一些大的遗址不能存放在原地而需要被移置,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阿斯旺大坝建立时被迁的闻名于世的阿布辛拜勒神庙。

在某些情况下,发掘文物的过程中必须做好保护工作——例如对待含有有机材料的文物。金属、玻璃、陶瓷等制品的文物必须采取特殊的方法加以处理,以便日后保存和修复。为此,研究人员在大型博物馆附属的或作为独立科学研究单位的专门实验室里研究出了一些近乎完美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正广泛开展各组织间的合作。这些组织包括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设在罗马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其中一些组织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组织了一些活动来拯救著名的历史遗物和遗址——如帕特农神殿、吴哥窟、摩亨佐—达罗、阿布辛拜勒神庙和菲莱神庙——通过国际科学与财政合作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考古学家还与实验室工作人员合作,来断定所发掘的人工制品的起源及原材料,由此为贸易关系、路径和技术技能的传播提供了线索。在此类研究中,自然科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化学、微量化学、摄谱学、岩石学等。

尽管了解构筑物 and 人工制品(工具、武器等)的不同种类的用途是考古学的一部分,但与其他部分相比,这部分比较特别。就人工制品而言,出现越来越多的试验分析,如化学试验、岩石试验、金相试验和X光检查以及其他一些实际试验:需要制作副本,重建工作方法以及由人种学或工业革命前的工具和制造方法所提供的类比。然而,这些对照物的使用需要相当谨慎。直至最近这方面尚未取得进展,例如:虽然燧石技术的使用众所周知,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它们的使用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直到1964年苏联考古学家S. A. 谢苗诺夫才开始了燧石制造工艺的跟踪研究。借助于“微磨损分析”,即在显微镜下观察遗留在燧石器具上的磨损的痕迹,才有可能断定这些人工制品被用于加工的原材料(木头、骨头、外皮、肉等),从而探究出它们的使用目的。

显然,目前在考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考古的所有实验方法)仅仅是第一步,期待将来还有更长远的发展。

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

前文已提及了体质人类学及其与史前考古学的密切关系,在此姑且做一简要回顾。古人类学主要研究最古老时代遗留下来的人类化石,同时试图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该学科不仅涉及到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还牵涉到分子生物学甚至大猿类的行为学(如大猩猩、黑猩猩和猩猩)。近来,体质人类学也牵涉在内。因此,假如一位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史前时期的大坟场,他(她)会被建议立刻与人类学家合作。人类学家可以采集一些人口自然方面的信息,例如年龄、性别、身份、死因、他们的预期寿命、男女比例和不同的年龄组等。对骨骼的检验可以发现一些古人生前遭受痛苦而留下的骨折、伤口、肿块和骨损害,如佝偻病、龋齿、坏血症、各种风湿病、痛风、梅毒、天花、疟疾、脊髓灰质炎、麻风病和昏睡症。值得一提的是,对早期医疗成就的追踪考察,发现它常与巫术联系在一起,如为减少骨折或新石器时代的颅骨穿孔术:将石器放在病人体内,一些人得以存活。对考古学和人类学而言,古病理学已成为有价值的辅助性科学(Wells, 1964; Janssens, 1970)。还需指出的是,对火葬骨的研究,可以得到与研究未火葬骨相似的信息。

遗传学试图提供一些关于当代人群体质类型与它们在史前发生分化的方式之间的生物学联系。利用DNA(细胞核中的脱氧核糖核酸,传递基因特征)突变的研究,生物遗传学已经提出关于人亚科和最早人属(见第1章与第2章)进化的创新理论。历史血液学与基因学联系紧密,它主要研究血液以及血液成分中的某种特性或异常现象,有时能提供历史信息。一个例子便足以说明这一点:1955年,在委内瑞拉的一个部落人群的红血球细胞中发现了原始血型——“迭戈血型”。如今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亚洲东部人口中也发现了这一血型。通过血液研究,我们可以证实旧石器时代早期亚洲人经过漫长的跋涉后迁入美洲(Bernard, 1983)。

文化和社会人类学——人种学

前文已讨论了人类学在美国的应用:包括史前史在内的不同种类的学科总称。根据这一概念,人类学首先是一门具有通则性趋势的比较性社会科学。换言之,它旨在重现主导人类社会行为的律则。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史前史是一个历史性的学科,而历史——正如其他人文科学一样——不是通则性的,而是独特性的。根据美国人的观念,只有通则性的科学才可称之为“科学”,而人文科学不是科学(因为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不受律则制约),只能称之为“人文学”或“人文研究”。旧有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遵循律则,以直线式向前推进。尽管在欧洲这种想法早已不复存在,但人类学学派的某些继承者仍然对此表示支持,如在G. 威利和P. 菲利普斯合著的一本关于考古学

的美国教材中(Wiley and Phillips, 1958)。这些作者认为考古学和史前学应该坚决放弃历史研究的目标和方法(历史被狭义地理解为根据对历史事件的兴趣记录历史事实——如今几乎没有哪位历史学家会赞同这一定义),相反,人们论述史前社会时所采用的方法,应该和人种学家研究那些现今仍没有文字的民族的文化一样。他们认为这些社会应根据其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加以分类,无需考虑空间和时间(“永恒和无限”这类词不断出现),而应该在时间和地理的背景之外去探寻它们所处发展阶段的原因。应该看看那些复杂的原因是否再次出现,针对重复出现的案例,应致力于推导出决定不同时段、不同区域相似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律则。因此,威利和菲利普斯排除时间和空间的影响,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所用的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学方法。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人类学家都持有这种态度,如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 1967, p. 23)曾写道:

以我们没有足够的方法来鉴定为借口,轻视[人类学的]历史维度,会导致我们满足于这样一种接近枯竭的社会学,从而造成现象完全脱离了根基。

暂且不提这些争论,毫无疑问,文化及社会的人类学和人种学通过提供一些阐释模型,对史前文化的阐释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通史性作品在论及石器时代时,仍然包含有论述使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技术的当代人类的章节。在这方面我们需小心谨慎。

环境科学

高标准的文物发掘项目往往对所有资料的系统化收集倍加重视,这些资料可提供有关自然环境以及那些留下遗迹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群落环境的信息。在过去,不论是旧石器时代的猎人,还是中世纪的农民,环境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都非常大。前文提到,对环境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中叶,此后,人们对此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目前,一些“新考古学”学派的成员认为是他们最早提出了环境的重要性,甚至相信某种环境决定论。然而这样做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类拥有最强的适应最多样化生存环境的能力,其行为绝不会严格受制于环境,尽管人类会尽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环境的潜能。况且,从食物生产开始,人们便逐渐改变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从本质而言,环境本身受土壤性质和气候两大因素的影响。这两大因素同时也影响着植物群和动物群,这是史前人群的主要生存资源。对环境及其演化的研究涉及到了许多学科,主要如下:

地质学

其中之一是关于第三纪、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地质学,包括海床核心取样、冰川和冰碛的研究、河流地质、洞穴沉积、对硅藻和

土壤沉积的研究,还可能附加地形学、造山运动、构造地质学以及更为一般的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

自1901年彭克和布吕克纳共同出版关于冰河时代的著作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古气候知识,从地质学方面(结合其他学科如古植物学和核物理)所做的工作显得日益重要。例如,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冰碛的研究,显示了冰盖的推进和后退,填补了我们对冰川期和间冰期的更迭、各自的时段、中间时距、波动、振幅等的认识。20世纪40年代,大量证据显示,海水中含有两种不同的稳定氧同位素:氧-16和氧-18。它们的比例随每年水温的变化而变化:温度愈高,氧-18的比例就愈高。即使是温度轻微的变化都会导致两种同位素在比例上的可测量差异。20世纪60年代,通过核心取样,对覆盖格陵兰岛的1400米厚的冰盖进行了深入探索,这是其实际应用的一个重要例证。过去8300多年的年降雪等级(雪已经变成冰)可以得到确定,由此可以确定这段长时期内最细微的气候变化,尽管只是在北半球范围内。对于更早的时期,每年的降雪等级尚无法确定,需要进行一些复杂的计算,但结果并不可靠。最近人们发现,两种氧同位素在覆盖海床的有孔虫壳上存在相同的波动。对海床沉积物采取核心抽样的方法,能达到相当的深度并追溯到遥远时代,这便有可能建立一系列较温暖或较寒冷的时期和相关土地地质数据。因此可计算每一阶段的大致时间,并使用放射性碳以及钍-230(见第11页)标注出最接近的年代。

造山运动、构造地质学和古地理学也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数据,Y.科庞(Coppens,1983)认为东非大裂谷的坍塌可以解释人类的起源便是例证。在末次冰川期,阿拉斯加的或前进或后退的冰川,或阻止或允许人类进入美洲(第29章)。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期,厚冰盖融化后造成海平面上升,并伴随着相当大的地壳均衡运动,改变了人类生存环境,例如造成英国与欧洲的大陆桥坍塌、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出现以及海岸线的重新形成。

古植物学

这是一门研究早期植被和植被演变的学科,一部分是基于孢粉学(研究花粉的科学)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基于对植物遗留下来的微生物(通常在发掘的过程中以浮选的方式收集而成)的研究。与之相关的是古人类植物学,关注植物环境对史前人类行为的影响,以及反之,人类对植被的影响。这些研究还包括特别针对植物驯化的方面(见第37章)。

最普遍的方法无疑是花粉分析法。在有利的情况下,当花粉未受到与之不适合的土壤破坏时,即使是旧石器时代的植物环境也可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重建。然而,该方法主要用于最近发掘的全新世时期遗址。全新世可细分为五大气候时期:前北方气候期、北方气候期、大西洋气候期、亚北方气候期、亚大西洋气候期。该划分大部分基于孢粉学的调查结果,这是一种相对年代测定的方法,尤其适用于丹麦、荷兰、法国及英国等国家,在这里,花粉分析的数量足够准确地反映特定地区的植物环境演

变过程。

另一门学科树轮年代学是以植物遗留部分为基础的一种年代测定法。可依据树木年轮的生长厚度收集气候信息,年轮的形成由当年的温度和湿度决定。

古动物学

古动物学和动物古生物学(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动物”)可提供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地区动物群的相关资料以及该动物群的进化信息。其中一个特殊分支涉及动物驯养(第38章)。古动物学提供有关早期的猎人、驯养者以及渔民的生活和饮食的宝贵资料。

在大多数情况下,某些特殊时期、特殊地区的动物群有其特性,因此也可视为一种年代测定法。此外,某些动物物种的古生物学变异有助于建立相对年代学。例如,非洲东部猪的祖先变异(当然是在被驯化之前)对某些地层的相对年代测定有一定的帮助,这些地层中也发现了原始人类的化石骨骼。

古动物学的研究不完全局限于巨型动物的遗骸:那些微小的动物如一些啮齿类动物、昆虫和软体动物也可以提供宝贵的信息。例如,软体动物学——对软体动物的壳的研究,特别是蜗牛,它们有些生活在户外,有些生活在森林,有些偏爱干燥的天气,有些喜欢潮湿的气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发现软体动物壳的地层形成时的气候条件。

年代测定法

我们已强调过,史前史学家需要使用年代测定法。长期以来,史前史学家未能建立一个精密的纪年法,如用数字纪年,而不得不满足于相对年代学(以此决定不同文化痕迹的时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出了一套可信度越来越高的精密测年法,主要得益于实验室技术的进步,及其对史前时期绝对年代测定法的革新。

相对年代学

由于对考古材料进行了更严格、更客观的分类,类型演变法已相对完善。同样,地层分析法得益于发掘技术的巨大进步,在某些情况下可建立一个“微观地层学”。“细致寻找”或“密切关联”法以及对照性历史年谱得到更广泛、更严格的使用。在1939年前所有已知的理论以及之后运用于实践的研究方法中,有一种值得提及:通过测量同一地点骨骼中的氟、氮和铀成分,可以对骨骼进行相对年代测定——这一方法曾揭露英国声名狼藉的皮尔当赝品。还可以通过测量水合作用层的厚度,对同一地点的黑曜石人工制品进行相对年代测定。有些相对年代测定法以对考古学遗留物的统计评估为基础。此外,一些环境科学如冰川地质学、海床地质学、孢粉地质学以及某些动物物种的变异,有助于确定一个地质层或考古层所处的特定气象阶段,从而为相对年代测定提供参考因素。

精密时计年代学

该术语不是指“绝对年代学”，因为它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方法尽管能用数字表达时间，但一般只是比较接近或存在一定误差，当然日历上记录的可靠年月除外。然而，考虑到史前时期的跨越长度，测量出现的误差在几百年之内已属不易，对更久远的年代而言尤为如此。

在精密时计年代测定法出现之前，应提到德·耶尔的黏土纹泥分析法。这种方法虽未被完全弃用，但其应用领域有限，且一般认为此法不可靠。至于 M. 米兰科维奇的理论，他计算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曲线，认为这与冰川期和温暖的间冰期之间的交替变化曲线有关，相信可以根据曲线进行绝对年代的测定，但这种方法似乎已被完全弃用，至少被考古学家弃用了。

在此，我们仅论及现今最常用的几种方法。

树轮年代学 如前文所述，由于气候的影响，该年代测定法的运用首先以树的年轮数和年轮厚度的变化为基础。树轮年代学方法有限，需注意有些树种对环境变化很敏感，而其他树种不具备此类敏感度或根本不敏感。此外，既定地区的数据不可自动转用于有差异的另一地区。但现在，树轮年代学的使用率逐渐提高，因为它通过样本测定可追溯到 8 000 年前。此外，它可用于检查其他年代测定法的准确性，尤其是放射性碳测定年代（见下文），因而有其独特的重要性。

放射性碳测年法（碳-14 或¹⁴C 测年法） 1949 年，美国物理学家 W. E. 利比通过对碳-14 的测量提出了绝对测年法，引发了考古学界的重大革命。这一方法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强烈支持和一部分人的反对。毫无疑问，这为史前考古学提供了可靠的时间顺序基础。尽管与树轮年代学相比，其准确度和精确度需要修正和校准。碳的同位素众多，包括稳定的碳-12 和放射性的碳-14。大气氮受到宇宙辐射，在电离层的上层形成碳-14。所有活着的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都含有一定量的碳-12 和碳-14。碳-14 会逐渐分解，变回氮-14，但因与环境进行交换，在活着的生物体中碳-14 浓度不变。生物体死后，这种交换即停止，碳-14 含量以稳定的速度减少：5 730 年后（原计算为 5 568 年），只剩下一半（即 5 730 年的半衰期）；再过 5 730 年，只剩原来的四分之一，以此类推。通过相对复杂的实验室方法得出样品（木炭、骨头、木材或其他有机原材料）中碳-14 和碳-12 的比例，从而计算出样品生物体的死亡时间。根据实验室惯例，所有放射性碳测定都会标明“BP”（before present, 距今）；以 1950 年作为参考年来计算（1949 年即为“1BP”）。若将时间转换为公元，则必须用实验室给出的时间减去 1 950。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在其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上标明 BP。然而，为了避免枯燥计算让读者误认为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是真正的公历年，且考虑到放射性碳测定仍有很多不准确性，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估计数，因此通常用类似“大约 5 000 年前”的方式加以表述。

研究初期，物理学家和许多考古学家之间存在不少误会。

实验室得出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都有标准偏差（或称为误差率），书写时用希腊字母“ σ ”表示，相当多的考古学家认为真实的公历年代处于标准误差之内。比如，一个时间为“4 550 ± 200BP”，他们认为真正的时间该在公元前 2800—前 2400 年之间；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真实年代在标准误差内的可能性只有 68%。一些考古学家有时会忘记放射性碳所测定的时间是从样品中有机组织死亡开始的，但在有机组织死亡和人类使用该材料的时间（考古学家当然希望了解的时间）之间，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跨度。碳-14 测定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恶劣环境下的取样或保存不完善、样品受到其他污染等。事实上，单一的碳-14 测定年代并不完全可靠：为了有足够的误差来测定地点、文化或文化阶段，我们需要一组相互重合的时间。

自第一次引进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后，误差一直可以观测出来。该测年法的一个主要先决条件——宇宙辐射的强度持续不变，被证实是错误的：当用碳获取的结果与通过树轮年代学得到的结果相比时，便会发现两个时间曲线在 8 250 年前（用树轮年代学能测到的最早时间）出现了分歧，相差约 1 000 年，而碳测定的年代近得多。一个更加准确的数据是以 5 730 年，而不是 5 568 年作为碳的半衰期进行计算，但这将带来不少困难，因为数以千计的已公布的碳测定年代是以 5 568 年作为半衰期的。因此，考古学家一直在努力地制作大量的标度表（介于以 5 568 年为半衰期的碳-14 测年法所得的年代和树轮测年法所得的年代之间），然而所得结果无一获得核物理学家们的一致认可。最新标度表（刊登于《放射性碳》，1982 年第 24 卷第 2 期和 1986 年第 28 卷第 2 期）也没有体现出任何重要的分歧。很显然，即使有了校准年代，也需要考虑标准偏差 σ 。况且，真实的时间在标准误差范围内也只有三分之二的几率。

除了这些不足，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仍可以准确地回溯到 4 万年前（尽管不能建立一个详细年表）。在理论上，这种方法可回溯 8 万年的时间，但对如此久远的物质的准确性就降低了，因为其中残留的碳-14 的含量非常少。

运用加速器质谱法（AMS）的新技术仍处于试验阶段。这种方法直接测量碳-14 的浓度，而不是通过测量衰退率来计算碳-14。该技术有两大优势，一是要求的材料少（样品碳含量不超过 10 毫克），二是可追溯的时期更为久远。

钾—氩（K—Ar）测年法 该测年法亦根据放射性来测试。火山岩浆冷却形成的火山岩中含有钾的放射性同位素（钾-40）。这种同位素出现衰退后，89.52% 转变成钙的同位素（钙-40），10.48% 转变成氩的同位素（氩-40）。岩石的年龄可通过确定钾和氩的含量进行估算。钾-40 的半衰期为 1.25×10^9 年，即 12.5 亿年。尽管它不适用于低于 10 万年的时段，但该测年法的运用可以提供地球存在的 50 亿年之内的时间。对考古学和人类学而言，此法使测量位于火山地层之间的东非人类祖先化石层成为可能。

古地磁学 地球两极的磁场每年都有轻微的变化，因此地

极和磁极会出现偏差。然而,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出现了多次两极完全调转的情况,磁场向南。在过去的 500 万年中,发生过四次这样大的反转,分别为布容、松山、高斯和吉尔伯特反转,还有一些小波动不必详述。海洋沉积物中的火山岩和铁磁颗粒保持了各自形成时候的磁极方向,犹如化石。海底核心取样试验建立了磁极反转的地层学,可以通过放射性的方法来测算年代。因为反转在地球任何角落都一样,可以追溯到相同磁性相位的火山地层或沉积物地,又可联系已知年代的地层来测定年代。

12 需注意,在磁极反转的时段,地球失去了免受宇宙辐射的磁保护,这可能会影响到气候和动物群。

热释光法 (TL) 该方法主要用于测定焙烧黏土制品的年代。土壤,包括用来制陶的黏土,含有多种自然同位素,主要为铀、钍、钾和铷。它们能照射某些矿物质如石英,导致电子产生位移,以一定的速度积聚成“圈套”(或晶格的瑕疵)。当矿物被加热到 320℃ 或更高时,积聚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一旦冷却,因为放射,物质又会再次积聚能量。比如,陶器在烧制过程中所含的石英会释放积聚的能量,而一冷却石英又会再次吸能。陶瓷碎片加热时,能量会随光散发更多。光的强度取决于能量积聚的多少。在实验室通过复杂的过程可测得光,并确定能量积聚率,因此可计算出陶瓷出炉的时间。烧过的燧石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测定。该方法已经成为测定熟悉制陶工艺的史前文化最可靠的方法。

其他年代测定法 还有很多其他的测年方法,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恕不一一赘述。这些方法在考古学界都有严格的应用领域,或不可靠,或处于试验阶段。

在众多测年方法中,依靠放射性衰变的方法有铀—氦 (U-He) 测年法、铀—钍 (U-Th) 测年法、铀—钷 (U-Pa) 测年法、钷—钍 (Pa-Th) 测年法(用于探测海底地层的年代)、铷—锶 (Rb-Sr) 测年法(主要用于测量地球最老的岩石和测定来自月球的岩石碎块)、铀元素家族的不平衡研究以及通过数裂变径迹(用来测量含铀同位素 U-238 的矿石,例如锆石、榍石、独居石、磷灰石,或火山玻璃碎片,如黑曜石、浮石)测定年代。此外,最近研发的方法有,通过非摧毁性伽马射线光谱直接测年。用于测量化石骨骼年代的氨基酸的外消旋作用,尽管仍在试验阶段,但从一开始就过于精细、过于不稳定而不能广泛使用。最后,还有仍处在研发阶段的电子自旋共振法 (ESR)。

史前考古学的阐释问题

前文已讨论了考古材料的分类。这里必须再回到材料的分类。在史前研究形成期,由于受到地质地层和自然科学中进化论的影响,考古学家们相信人类文化的进化呈直线型,因此为了将考古遗存划入进化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他们使用了**参考化石**。然而,随着材料数量的持续增加和史前考古学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通过不计其数的具体案例,这一理论的荒谬之处很快便暴露出来。由此,通过效仿前辈 H. 谢里曼和 R. 庞佩利,考古学

家们开始根据文化对考古遗存进行分组——各种语言均使用“文化”一词。(法语中,原倾向于使用 civilisations,但现在倾向于使用 cultures。)该词源自人种学,有“物质文化”、“道德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分。人种学家运用地理和统计分布来确定“文化区域”。早在 20 世纪初,考古学概念中的“文化”、“文化区域”和“文化水平”均来自德国,而 G. 科辛纳及其弟子赋予这些概念人种、语言学和种族上的含义。在英国, V. 戈登·蔡尔德自 1925 年享誉欧洲大陆直至 1957 年去世,他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对科辛纳的解释表示反对。

1929 年,蔡尔德(在其著作《史前多瑙河》第 v—vi 页中)为考古学文化做了如下定义:

我们寻找某种类型的不断一起出现的残骸——罐子、器具、装饰品、埋葬仪式、房屋结构。对这种彼此关联的特征综合体,我们称为“文化群”或“文化”。我们假设这样的综合体是当今所说的“民族”的物质表达。

在最后一句话中,“民族”一词在今天已有严格的含义,但将之运用于遥远的史前时代,我们尚存疑虑。假如它被更宽泛、更模糊的词语“人群”取代,蔡尔德所做的定义(文化是人工制品的总和——工具、武器、装饰物和结构如居所、坟墓、筑垒等——通常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通过在特定时段、特定地区的居住地平面图、葬礼习俗、社会经济组织得以展现)作为基本分类单位,到今天依旧被广泛接受。然而,史前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促使史前史学家有必要通过强调史前文化的其他方面来扩展这一定义的范围。一方面,史前史学家坚持史前群落的保守性,传统和祖传的观念与概念描述规定了各种准则,这些准则通过人工制品和饰品的生产、居所的建造、与集体生活中每一件大事(如生和死)相联系的各种仪式得以遵循。另一方面,史前史学家也意识到每一种文化是群落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因此,文化可定义为对某一人群及其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宗教概念及动态的考古学反映。然而,这是一个理想定义;事实上,用于定义文化的标准依然具备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因调查者的学派、意识形态、采用的方法不同而存在差异。由此,“参考化石”尽管具备片面性,仍被赋予了太多与其真实价值不成比例的作用。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时期可能发现不同的文化,或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地区,甚至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区里也能发现不同文化。

文化的概念仍然构成了解决阐释难题的基础。在某些情况下,不同文化比较容易界定。主要因为在人群规模相对较小、稳定且固定的时期,人群分开居住,所有接触都是零星的。而在其他时期如旧石器时代,则恰恰相反,人工制品(基本上是石器和骨器)的种类相对较少,类型演变也相当缓慢,因此在大范围内出现同样的聚合。这些考古遗存并非根据文化分组,而是以聚合方式分组,依次分为**工艺综合体**、**工艺、阶段和考古学层**。然而,最近几年发掘技术的改进推动了其他考古信息种类的开发,

如住所结构、坟墓、造型艺术品等,从而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考虑根据文化进行分组。然而,从工艺观念到文化观念的过渡导致问题丛生(Otte, 1985)。在久居人口较少的情况下,不同人群之间的接触更为频繁,个人更容易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就更难对文化进行明确界定:此时便形成了文化综合体,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过渡是平缓的,且几乎不可能划出明确的文化边界。至于进化更高级的人群遗迹如斯基泰人或凯尔特人,同其他人种的贸易往来、根深蒂固的社会差异、不同部落间的相互依赖性引起的联系等破坏了相关考古资料的同质性,同时使得考古学的文化界定容易出错。这当然也凸现了针对某些文化提出的种族、语言、人种或政治阐释的虚幻性(De Laet, 1957, pp. 76—92)。

对考古资料进行阐释的局限性姑且谈到这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利用这些资料,以期做出积极贡献。当然,需考虑到史前史学家使用资料时所采取的意识形态方法及所属学派的哲学观。这些不同的观点在实地调查中很少相遇,但它们将融于对考古资料的阐释之中。关于这些不同学派和倾向的讨论已超出了本综述的范围。本卷合著者显然各属不同派别,而在编写过程中不用说他们有完全的解释自由,因此在这方面不存在丝毫的压力。

然而,鉴于“新考古学”对多数年轻的史前史学家的影响及其对史前文化“历史”阐释的反对,下面需略加说明。“新考古学”顺应美国人类学的发展趋势(见第8页),并起源于此。这一学派由张光直(Chang, 1967)和S. R. 宾福德以及L. R. 宾福德(Binford and Binford, 1968)提出,因D. L. 克拉克(Clark, 1968)流传欧洲。事实上,“新”考古学并非那么新,其主要特征在许多早期研究中已有发现。然而,这一新学派的追随者声称有权质疑在宾福德兄弟之前考古学所确立的任何东西。显然,“新考古学”具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一个典型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家们对考古学的认识论、理论和方法的兴趣。每年都会发布该领域相关的新论文,这或许可以描述为“理论考古学”(Klejn, 1977)。这些文章的作者很少具备丰富的野外发掘经验,他们的理论远没有日常现实中的考古学那么详尽,很少经受实际应用的考验。“新考古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说明文化进程及文化渐进式的变革,因此“文化”一词采用的是人种学意义,涵盖道德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物质文化。因此,考古学应当拓宽研究范畴,同时研究这些非物质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考古学应当参考人种学的范式,并根据人种学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推断。对于过度比照人种学的做法,我们已表示了担忧。在“新”考古学家看来,这一初级目标不但有可能实现,而且通过阐释文化过程还能够发现文化动力的法则,甚至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

“新考古学”的追随者严厉批判了将对考古资料的分类视为达成目的的手段的旧方法,而建立了一种新类型学,对考古资

料进行分类和计算机处理。下一步是构建模型,试图解决特定问题,并严格控制操作性假设。考古学中模型的使用也并不新鲜。模型一词借用于社会学,首先是指决定考古学家逻辑推理的基本原则。例如,当特定区域内的文化改变是从移民或考古文化的种族角度进行解释时,便会使用到特定的模型。从狭义而言,模型是一种可以用数学或类似数学公式表达的原理,以此支撑考古调查的主导理念。该类模型同样用于文化人类学,是启发式图解、操作性假设而非纯粹的理论。“新考古学”唯一的革新是比以前更系统地使用了模型。然而,模型的使用也并非毫无风险。一些考古学家毫不犹豫地以任何代价“强迫”事实符合模型,而不是努力地查明他们构建的模型是否与考古事实相抵触。即使模型形成了正面结果且似乎证实了假设,也不能推断模型是正确的:没有理由可以解释基于相同资料的另一条假设为何不应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基础资料越多,模型里包含的变量就越多,那么所推导出来的正面结果也就越有可能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考古发现所覆盖的方方面面,其中五个显著方面如下:

1. 所有与生产、生产手段和经济相关的遗存:工具或器具,与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的证据,建筑物(住所、谷仓、工作间)的痕迹,矿山、采石场、桥梁、轨道、堤坝,同其他群体交易或贸易的证据等。
2. 与日常生活所需相关的遗存,例如食物、服装和家用器皿等。
3. 用来满足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或)审美需求的遗存。这些遗存有着特定用途,同样也用于装饰(如衣物、皮带、搭扣、装饰陶器等)。也有些物品可能会被当作声望或等级的象征(如仪式斧、用从遥远地方进口的或珍贵的材料制成的物品)。装饰物的重要性还在于装饰物通常具有传统性,并在特定文化的该类遗存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4. 反映精神和(或)宗教观念的物质遗存:葬礼习俗和结构、祭祀象征物、敬拜地点等。
5. 反映社会组织(史前文化越来越被强调的方面)的遗址。社会结构与生产、生产方法(前文第一方面)息息相关,并在第三和第四个方面中也得到体现。然而,还有许多遗存可以提供社会结构的直接信息:住所大小的差异及陈设的奢华程度不一(在一些遗址中心,首领的“宫殿”格外显眼,位于小山上,由壁垒防护,使之隔离于其他住所);同一个大墓地里各坟墓葬饰品富有差异;“君王”墓;只能在“首领”的带领下进行的工程(防御、灌溉和排水系统)遗迹等。

所有这些遗迹必须得到“解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进行解码的考古学家常常会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影响。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史前文化的确切性质的问题。人们认为种族阐释不符合任何实际,从而否定任何从种族角度出发的

阐释,因为没有人可以对史前的“族群”做出明确定义。况且,虽然一种文化可能对应于一个语言区,但许多例子表明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从政治的角度进行阐释也是如此。

可提出这样的定义:史前文化由人类群落(这是国际通用的界定最为模糊的术语)的所有遗存构成,包括共同的技术、经济、社会、宗教和美学传统;这种文化同时也普遍反映了该群体对自然环境的最佳适应。大多数文化持续了几百年,随着年代测定法所取得的进步,可以对它们进行历时研究,而且也可以探索其内部演进过程;一种文化可以与覆盖不同区域的同时代文化相比较。然而,先前的工作集中于对这些文化内容的静态描述,但现在已开始关注动态,研究兴趣也转移到文化演变的原因和形态之上;不仅对文化的特性产生了兴趣,而且尤其侧重于文化获得那些构成其独创性的特征的原因和方式,以及它们拥有不同于同时代或邻近文化特征的缘由。

(阮岳湘译)

参考文献

随着史前史及其研究方法、支撑学科的迅速发展,再加之几乎每年出现的大量考古新发现,关于考古方法论的大多数综合研究和著作也随之过时。因此,除了少量具有基本价值,或在史前考古学史中具有重大进步意义,或强烈影响史前研究的发展及当代观念的先前作品之外,我们在参考文献里只列举了1960年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

ADAM, J. P. 1975. *L'Archéologie devant l'imposture*. Paris.
 ATKINSON, R. J. C. 1946. *Field Archaeology*. London.
 BARISANO, E.; BARTHOLOME, E.; BARCOLONGO, B. 1984. *Télé-détection et archéologie*. Paris, CNRS.
 BARKER, P. 1977. *The Techniques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London.
 BERNAL, I. 1980. *A History of Mexican Archaeology*. London.
 BERNARD, J. 1983. *Le Sang et l'histoire*. Paris.
 BIBBY, G. 1957. *The Testimony of the Spade*. New York.
 BINFORD, L. R. 1962.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 Antiq.*, Vol. 28.
 ——— 1972.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London.
 ——— 1983. *In Pursuit of the Past: Decod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London.
 BINFORD, S. R.; BINFORD, L. R. (eds) 1968.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Chicago.
 BORILLO, M. (ed.) 1978. *Archéologie et calcul*. Paris, CNRS.
 BORILLO, M.; GARDIN, J.-C. 1974. *Les Banques de données archéologiques*. Paris, CNRS.
 BORILLO, M.; GUENOCHÉ, A.; VEGA, W. F. DE LA. 1977; *Raisonnement et méthodes mathématiques en archéologie*. Paris, CNRS.
 BRAIDWOOD, R. J. 1984. *Prehistoric Men*. Chicago.
 BROMLEY, Y. V.; PERSIC, A. I.; TOKAREV, S. A. 1972. *Problemy etnografii i antropologii v svete neucnogo nasledija F. Engelsa* [Ethnograph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Light of F. Engels's Scientific Heritage]. Moscow.
 BROTHWELL, D. 1962. *Digging Up Bones*. London.
 BROTHWELL, D.; HIGGS, E. S. (eds) 1970. *Science in Archaeology: A Survey of Progress and Research*. 2nd edn. London.
 BUSHNELL, G. H. S. 1965. *Ancient Arts of America*. London.
 CERAM, C. W. 1971. *The First American: A Study of North American Archaeology*. New York.
 CHAMPION, T. et al. 1984. *Prehistoric Europe*. London.
 CHANG, K. C. 1967. *Rethinking Archaeology*. New York.
 ——— (ed.) 1968. *Settlement Archaeology*. Palo Alto.
 CHAPLIN, R. E. 1971. *The Study of Animal Bone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London.

CHILDE, V. G. 1929.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Oxford.
 ——— 1942.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Harmondsworth.
 ——— 1957.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5th edn. London.
 ——— 1958. *The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 Harmondsworth.
 CLARK, J. D. 1970.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 1983.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C. 500 BC. In: CLARKE, J. 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Cambridge. Vol. I.
 CLARK, J. G. D. 1952.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London.
 ——— 1957. *Archaeology and Society: Reconstructing the Prehistoric Past*. 2nd edn. London.
 ——— 1977. *World Pre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 3rd edn. Cambridge.
 CLARKE, D. L. 1968. *Analytical Archaeology*. London. (2nd edn 1978.)
 ——— (ed.) 1972. *Models in Archaeology*. London.
 COLES, J. 1972. *Field Archaeology in Britain*. London.
 ——— 1979.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London.
 COLES, J. M.; HIGGS, E. S. 1969.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 London.
 COLES, J. M.; SIMPSON, D. A. (ed.) 1968.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Leicester. 15
 COPPENS, Y. 1983. *Le Singe, l'Afrique et l'homme*. Paris.
 ——— 1984. *Paléanthropologie et préhistoire: leçon inaugural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CORNWELL, I. W. 1958. *Soils for the Archaeologist*. London.
 DANIEL, G. E. 1975.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 London.
 ——— 1981.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 (ed.) 1981. *Towards a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DANIEL, G. E.; CHIPPINDALE, C. (eds) 1989. *The pastmasters. Eleven Modern Pioneers of Archaeology*. London.
 DANIEL, G. E.; RENFREW, C. 1988. *The Idea of Prehistory*. 2nd edn. Edinburgh.
 DECHELETTE, J. 1908-1914. *Manuel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celtique et gallo-romaine*. Paris. 4 vols.
 DEETZ, J. (ed.) 1971. *Man's Imprint from the Past: Readings in the methods of Archaeology*. Boston.
 DE LAET, S. J. 1957. *Archaeology and its Problems*. London.
 ——— 1963. Review of J. Hawkes and L. Woolley, *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Antiquity*, Vol. 36, No. 148, pp. 322-327.
 ——— 1971. Un Siècle de collaboration dans le domaine des sciences préhistoriques et protohistoriques: du Congrès de Neuchâtel (août 1866) au Congrès de Prague (août 1966). In: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PRÉHISTORIQUES ET PROTOHISTORIQUES, 7, Prague, 1966. *Actes* (Prague), Vol. 2, pp. 1423-1439.
 ——— 1978.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In: HAVET, J. (ed.),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Paris, UNESCO. Vol. I, Part 2, pp. 177-226.
 ——— 1979. *Rapport à la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pour une histoire du développement scientifique et culturel de l'humanité sur les parties concernant la préhistoire dans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cet ouvrage*. Paris, UNESCO. (Mimeo.)
 ——— 1985.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 In: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16, Stuttgart, 25 août-I sept. 1985. *Rapports*, Vol. I; *Grands thèmes - méthodologie*. Stuttgart. pp. 149-179.
 DENNELL, R. 1983. *European Economic Prehistory*. London.
 DIMBLEBY, G. W. 1967. *Plants and Archaeology*. London.
 DORAN, J. E.; HODSON, F. R. 1975.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Archaeology*. Edinburgh.
 ECKSTEIN, D.; BAILLIE, M. G. L.; EFFER, H. 1984. *Dendrochronological Dating*. Strasburg,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Handb. Archaeol., 2.)
 ELIADE, M. 1976. *Histoire des croyances et des idées religieuses: I — De l'âge de la pierre aux mystères d'Eleusis*. Paris.
 EVANS, J. G. 1978.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London.
 FAGAN, B. M. 1974. *Men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Boston.
 ——— 1978. *Quest for the Past: Great Discoveries in Archaeology*. Reading, Mass.
 ——— 1985. *The Adventure of Archaeology*. Washington, DC.